

城市创业活跃度:区域差异、动态演变与影响因素

李彦龙^{1,2}, 毕钰³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2488;
2.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1;
3.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0070)

摘要:基于2016年1月—2020年12月的工商注册数据,考察创业活跃度的区域差异、动态演变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南部沿海处于第一档次,长江中游、黄河中游和西南地区处于第二档次。(2)区域差距整体在缩小,但主要城市与其他城市间长期存在较大差距,八大地带间的差距也未缩小。(3)主要城市与其他城市间的差距大于内部,八大地带内部差距在缩小但仍大于八大地带间。(4)数字经济、产业升级、交通便利和金融发展整体拉大了地区组间差距,市场化和财政支出缩小了地区组间差距。对全部城市间的差距,数字经济之外的因素均为缩小作用。(5)解释率最大的变量是数字经济和市场化,其次是产业结构和金融发展,其中金融发展更大程度上解释的是主要城市和其他城市间的差异。

关键词:创业活跃度;区域差异;动态演变;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66(2023)05-0099-08

Urba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regional differences, dynamic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LI Yanlong^{1,2}, BI Yu³

- (1.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2. Institute of Digital Financ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data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20,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dynamic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eastern coast, the northern coast and the southern coast are in the first grade.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southwest are in the second grade. (2) The regional gap is shrinking as a whole, but there is a large gap between major cities and other cities, and the gap between the eight zones has not been narrowed. (3) The gap between major cities and other cities is larger, the gap within eight regions is narrowing but still larger than that between eight regions. (4) Digital economy, industrial upgrading,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and financialization have widened the gap between regional groups, marketization

收稿日期:2023-01-01 修回日期:2023-04-2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273005);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启动专项(校20230076);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市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XRZ2023056)。

作者简介:李彦龙(1991—),男,河南内黄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应用计量、宏观与区域经济、创新经济、金融科技。通信作者:毕钰。

and financial expenditure have narrowed the gap between regional groups. Factors other than the digital economy are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all cities. (5) The variables with the largest explanation rate are digital economy and marketization, followed by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financialization. Financialization explain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ajor cities and other cities to a greater extent.

Key words: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regional differences; dynamic evolu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中小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生力军,贡献了 90% 以上的市场主体,80% 以上的就业机会,70% 以上的发明和专利,超过 60% 的 GDP 和 50% 以上的税收。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而推动落后地区创业机会的提高,促进地区间创业机会均等化,是激发市场活力和释放发展潜力的重要力量,对扩大就业、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文献已经对创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多研究,中国创业活跃度在城市间的差异尤为明显^[1],由于数据可得性原因,现有研究多数从省层面的差异进行考察。然而,仅从省之间的创业活跃度差距进行考察,对省内的区域差距是怎样的尚无法深入,也对中国地区间的创业活跃度差距并未有更加客观的认识,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区域差异还未得到系统的研究。本文基于 2016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城市层面的工商注册数据,研究创业活跃度的区域差异,对区域创业活跃度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

一、文献综述

与创业活跃度相关的文献目前主要包括创业的经济影响、创业的影响因素、创业者行为与创业过程等。在创业的经济影响方面,Wong 等^[2]利用 2002 年 GEM 37 国家的横断面调查数据,发现只有高增长潜力创业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Wennberg 等^[3]利用 2002 年 GEM 36 个国家的调查数据,发现创业活动比例与国家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

更多的文献考察的是创业的影响因素,郑馨等^[4]发现社会规范对创业活动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谢绚丽等^[5]发现,数字金融对于城镇化率较低的省份、注册资本较少的微型企业有更强的鼓励创业的作用。万海远^[6]的研究结果发现,社区

基础设施具有很大的正向外部性,使得居民创业比例显著提升。此外,一些非经济类因素也会对创业带来影响,如文化多样性能够显著提高地区创业活力^[7]。

创业者行为与创业过程的相关研究中,Terjesen 等^[8]基于 GEM 2006—2007 年的调查数据,发现亚洲国家的出口导向型初创企业的创立率明显低于非亚洲国家。Levie 等^[9]基于 GEM 英国 319 家创业企业数据,发现逆向选择、机会主义和利基导向构成了英国家族企业成长战略的重要特征。

本文的贡献:一是现有研究主要是从省层面考察了创业活跃度的时间和空间特征,而本文基于城市层面的月度工商注册数据,首次从月度层面考察了创业活跃度在城市间存在的差异,并基于泰尔指数分解方法,对区域差异进行了量化分析。从城市层面考察区域差异,有利于更加客观地认识到我国创业活跃度的发展状况,对于如何缩小区域差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二是已有文献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因素在城市间所产生的效果还未得到进一步研究,本文基于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对创业活跃度及其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这为缩小区域差距提供了未来的政策方向。三是本文首次对创业活跃度及其区域差异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了考察,基于优势分析方法,提炼出了对创业活跃度贡献程度更高的影响因素。

二、研究策略

(一) 研究数据

本文所使用研究数据包括 2016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的城市层面的月度工商注册数据、2015—2019 年的地级市和省层面的经济数据。其中,各城市的注册企业信息来源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各省和城市层面的变量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此外,本文使用到的创业活跃度数据为 338 个城市从 2016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共 60 个月的研究数据,共计 20 280

个样本^①。在研究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因素时,所使用的样本个数为 17 388 个。

(二)研究方法

在考察创业活跃度的区域差异时,按照主要城市和其他城市、八大经济地带的划分方法进行比较。其中,主要城市包括 4 个一线城市、15 个新一线城市、30 个二线城市以及未包含在上述范围内的省会城市,共计 55 个城市,其余 283 个城市定义为其他城市。在经济区划分方面,采用八大地带的划分方法^②。八大地带包括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地区、大西北地区、东北地区^③。

在创业活跃度的动态演变描述部分,使用 Kernel 密度估计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分布动态演变,刻画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整体形态,比较不同时期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动态分布变化。

在量化城市间创业活跃度的区域差异时,主要采用泰尔指数分解方法。分别通过主要城市和其他城市、八大地带作为划分方法,并采用该方法将各城市之间的泰尔指数(*Theil*)分解为地区组之间的泰尔指数(*Theil_bt*)和地区组内部的泰尔指数(*Theil_wi*):

$$\begin{aligned} Theil &= \frac{1}{N} \sum_{k=1}^N \frac{Y_{jk}}{Y} \ln\left(\frac{Y_{jk}}{Y}\right) = Theil_bt + Theil_wi \\ &= \sum_j \frac{Y_j}{Y} \ln\left(\frac{Y_j/Y}{N_j/N}\right) + \sum_j \frac{Y_j}{Y} T_j \end{aligned} \quad (1)$$

式中, Y_j 表示地区组 j 内部的工商注册数据; Y 表示各城市的工商注册数据之和; N_j 表示地区组 j 内部的城市个数; N 表示城市个数; T_j 表示地区组 j 内部城市之间的泰尔指数; Y_{jk} 表示地区组 j 城市 k 的工商注册数; $\bar{Y}$ 表示各城市工商注册企业数的平均值。泰尔指数越大,则区域差异的程度越高。

基于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以工商注册数量作为因变量考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因素,计量模型为^④:

$$\ln number_{ctm} = \alpha_c + \gamma_m + rX_{ct-1} + u_{ctm} \quad (2)$$

式中,变量 *number* 为城市层面的工商注册数量。其中, c 表示城市; t 表示年度; m 表示月度。 α 和 γ 分别为城市 and 月度固定效应; u 表示随机扰动项; X 为解释变量。本文选择的解释变量 X 包括:①金融发展 *FD*,以各城市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与贷款之后与 GDP 的比值度量。②产业升级 *Ind*,以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度量。③财政支出 *Gov*,以各城市的财政支出总额与 GDP 的比值度量。④交通基础设施 *Road*,基础设施能够促进创业^[20],采用公路密度即公路里程与区域面积的比值度量。⑤数字经济 *Digital*。以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的“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度量。⑥市场化 *Market*。根据王小鲁等编制的中国分省市场化指数进行度量。对所有解释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在根据模型(2)实证检验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因素时,本文通过分位数估计检验各解释变量的差异影响,采用优势分析方法考察各解释变量的相对重要性。

三、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区域差异与动态演变

(一)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区域差异

主要城市与其他城市创业活跃度平均值的变化趋势如图 1 所示。图 1 显示,城市创业活跃度整体呈现了快速的上升趋势。虽然整体具有快速上升趋势,但上升速度更快的城市是主要城市。这也说明,主要城市集中了大多数的经济资源优势,政府政策也会在主要城市有所倾斜。经过计算可知,主要城市的创业活跃度基本上一直维持在其他城市的 7 倍以上,主要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长期存在较大差距。

① $338 \times 60 = 20\ 280$ 个样本。

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报告指出,中国所沿袭的东、中、西区域划分方法已经不合时宜。

③ 八大经济地带具体包括北部沿海(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东部沿海(上海、江苏、浙江)、南部沿海(福建、广东、海南)、黄河中游(山西、内蒙古、河南、陕西)、长江中游(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西南地区(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大西北地区(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八大经济地带内的经济环境相对更为接近,东中西三大地区内部的城市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计算泰尔指数时,以 2020 年 12 月为例,按照八大经济地带划分计算得到的组内泰尔指数大约为组间泰尔指数的 2 倍,但按照东中西三大地区划分计算得到的组内泰尔指数大约为组内泰尔指数的 4 倍。

④ 模型(2)中因变量为工商注册数量 + 1 后的自然对数,图 3 和图 4 的创业活跃度核密度估计采用了相同的处理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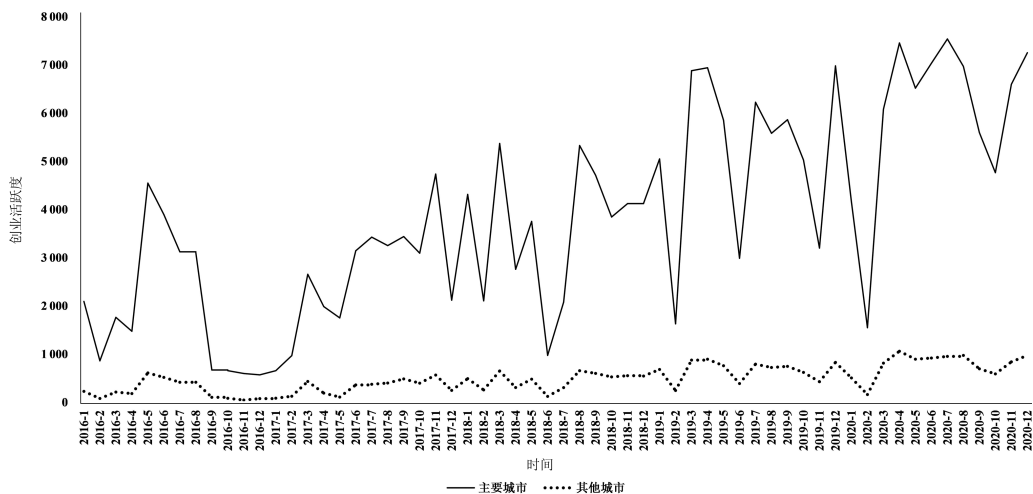


图1 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区域差异：主要城市与其他城市

进一步地,八大经济地带创业活跃度平均值的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图2显示,八大经济地带整体为快速的上升趋势,但之间的差距并未表现出缩小的趋势。最高的地区是东部沿海,其次是北部沿海,排在第三位的是南部沿海。排在第4~6位的地区分别是长江中游、黄河中游和西南

地区。此外,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南部沿海整体处于第一档次,远高于其他五大地带。长江中游、黄河中游和西南地区整体处于第二档次。综合图1和图2可知,主要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八大经济地带之间的绝对差距较大,也存在拉大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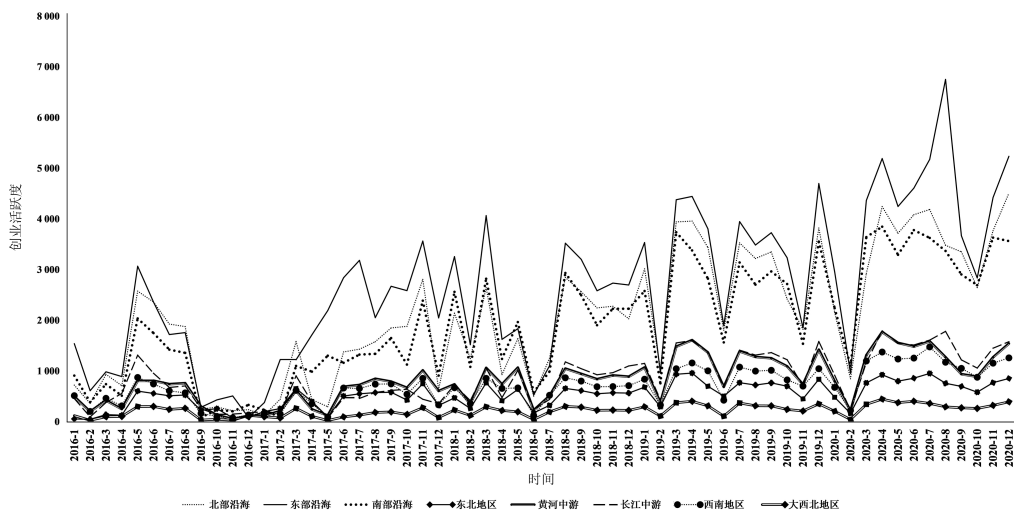


图2 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区域差异：八大经济地带

(二)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分布动态：核密度估计

根据城市创业活跃度的自然对数进行核密度估计,结果如图3和图4所示^⑤。其中,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带相对较为接近。图4中将这3个地带和其余五大地带划分为两组进行核密度估计。

从图3和图4可以发现,主要城市的分布峰值高于其他城市,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的分布峰值相对更高,并且分布整体位于其他城市和其他地带右侧。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布的位置整体向右移动,说明创业活跃度整体有了快速的生长。此外,分布整体表现为“高度变高、宽度变

^⑤ 图中对应年份的分布为当年12月的创业活跃度分布。

窄”的特征,说明主要城市间、其他城市间以及图 4 中的两大经济地区内部,区域差异整体具有缩小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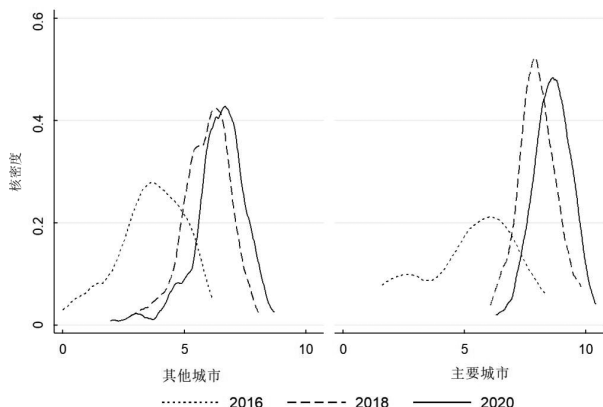


图3 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核密度估计:主要城市和其他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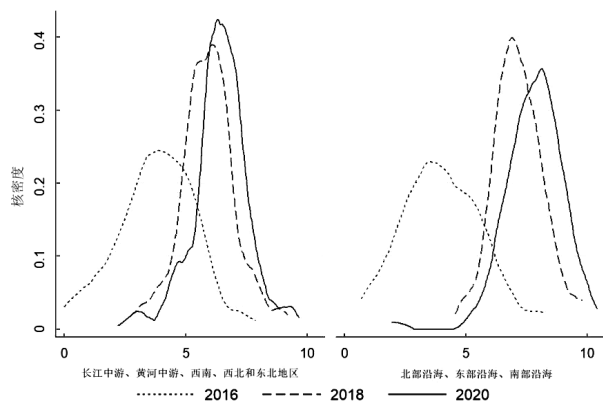


图4 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核密度估计:按经济地带划分

(三)泰尔指数分解

主要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和内部的泰尔指数计算结果如表 1 所示。表 1 显示,泰尔指数从 2016 年的 1.149 逐渐下降到了 2020 年的 0.780。组内泰尔指数从 2016 年的 0.680 下降到了 2020 年的 0.308,而组间泰尔指数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这一方面说明主要城市与其他城市的差距并未表现出缩小的趋势,主要城市与其他城市间的差距更大,说明主要城市与其他城市间的差距是更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说明主要城市与其他城市内部的差距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缩小趋势,同一档次城市间仍然表现出了收敛趋势。最后两列显示,主要城市和其他城市泰尔指数均为下降趋势,并且主要城市下降更快。

表 1 泰尔指数分解:主要城市与其他城市

年份	泰尔指数	组内	组间	主要城市 泰尔指数	其他城市 泰尔指数
2016	1.149	0.680	0.468	0.780	0.533
2017	1.078	0.536	0.543	0.521	0.561
2018	0.809	0.330	0.480	0.321	0.343
2019	0.845	0.313	0.532	0.287	0.354
2020	0.780	0.308	0.471	0.264	0.373

注:表中报告的统计结果是各年度 12 月的计算数据。

进一步地,本文以八大地带作为地区组进行计算,结果如表 2。表 2 显示,组内泰尔指数从 2016 年的 1.062 下降到了 2020 年的 0.523,而组间泰尔指数并未表现出明显下降趋势。这说明八大地带间的差距并未缩小,而八大地带内的差距却表现出了明显的缩小趋势。此外,虽然八大地带内部差距在缩小,但仍然大于八大地带之间,八大区域内部的差距是造成总体区域差距更为主要的原因。然而,八大地带内部的差距包含了内部主要城市与其他城市的差距,这也是导致组内泰尔指数远大于组间泰尔指数的原因。将主要城市数据剔除后重新计算泰尔指数,即表 2 最后 3 列的计算结果。当删除主要城市后,总体泰尔指数与删除之前相比得到了较大幅度下降,但整体仍然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

表 2 泰尔指数分解:八大经济地带

年份	全部城市			删除主要城市		
	泰尔指数	组内	组间	泰尔指数	组内	组间
2016	1.149	1.062	0.087	0.533	0.469	0.064
2017	1.078	0.779	0.299	0.561	0.319	0.242
2018	0.809	0.596	0.213	0.343	0.201	0.142
2019	0.845	0.593	0.252	0.354	0.167	0.186
2020	0.780	0.523	0.257	0.373	0.181	0.192

注:表中报告的统计结果是各年度 12 月的计算数据。

四、城市创业活跃度及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

(一)城市创业活跃度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对模型(2)进行估计,考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因素。将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划分为发达地带,将其余五大地带划分为其他地带,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第(1)列显示,产业结构、金融发展、交通便利、财政支出、数字经济、市场化等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正,除了财政支出变量的估计系数在 5% 的水平下显著外,其余变量均在 1% 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有助于推动创业活跃度的提高。

表 3 城市创业活跃度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因变量	lnnumber				
	全样本	主要城市	其他城市	发达地带	其他地带
	(1)	(2)	(3)	(4)	(5)
Ind	0.058 *** (8.87)	0.419 *** (5.37)	0.057 *** (8.69)	0.098 *** (4.25)	0.059 *** (8.96)
FD	0.146 *** (10.32)	0.183 *** (3.94)	0.116 *** (7.65)	0.228 *** (4.61)	0.144 *** (10.23)
Road	0.597 *** (7.13)	0.689 ** (2.21)	0.531 *** (6.23)	1.373 *** (6.07)	0.546 *** (6.27)
Gov	0.507 ** (2.26)	0.189 (0.55)	1.723 *** (5.06)	-0.895 (-0.72)	0.507 ** (2.34)
Digital	0.011 *** (21.90)	0.014 *** (11.81)	0.010 *** (16.72)	0.022 *** (18.00)	0.007 *** (12.27)
Market	0.990 *** (27.54)	0.383 *** (4.23)	1.126 *** (29.04)	0.313 *** (3.33)	1.082 *** (28.59)
城市、月度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7 256	3 300	13 956	5 208	12 048
R ²	0.304	0.293	0.314	0.345	0.292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 有统计学意义；括号内为 *t* 统计值。下同。

从第(2)列和第(3)列可知,产业结构、金融发展和交通便利对主要城市的促进作用更大。主要城市的产业基础好,金融发展水平高、交通更加便利,产业升级、金融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是拉大主要城市和其他城市的重要因素。财政支出对其他城市的促进作用更大,其中第(2)列中财政支出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财政支出对主要城市的促进作用相对不大。可能的原因在于,主要城市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创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也较小,财政支出的带动作用相对不大。数字经济变量在第(2)列的估计系数相对更大,但估计系数相差不大,这说明数字经济对主要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差距的影响不大。市场化对其他城市的促进作用更大。可能的原因在于,主要城市的市场化水平较高,市场化的带动作用相对会下降。综合第(2)列和第(3)列的结果可知,虽然产业结构基础、金融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会拉大主要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的差距,但财政支出和市场化抑制了差距的扩大,不同力量的存在使得主要城市与其他城市的差距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

从第(4)列和第(5)列可知,各变量的估计系

数与第(2)列和第(3)列表现出了类似的差异。此外,与第(2)列和第(3)列略微不同的是,第(2)列和第(3)列中数字经济变量的估计系数相差较小,不存在明显的差异,第(4)列和第(5)列数字经济变量的估计系数相差较大,数字经济发展对发达地带的带动作用更大。数字经济对主要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发达地带与其他地带之间差距影响不一致,可能的原因在于数字经济发展在空间上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10],数字经济在不同地带之间的差异更为明显,如江苏、浙江、上海等南方省份发展更为接近,由于市场环境不同,在发达地带能够发挥更强的带动作用^⑥。

(二)城市创业活跃度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分位数估计

进一步采用分位数估计方法对模型(2)进行估计,结果见表4。表4显示,随着分位点提高,产业结构、金融发展、交通基础设施、财政支出和市场化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下降趋势,说明有利于缩小城市间的差距。其中,前文表3中的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会拉大主要城市与其他城市、发达地带与其他地带之间的差距,而表4的分位数结果则发现金融发展缩小了城市间的差距,原因在于金融发展缩小了主要城市内部和其他城市内部、发达地带内部与其他地带内部的差距。对主要城市、其他城市、发达地带、其他地带各组样本分别进行分位数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产业结构、金融发展、交通基础设施、财政支出和市场化变量的估计系数均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⑦,缩小了地区组内部差距。

而数字经济变量的估计系数为上升趋势,对城市间差距具有拉大倾向。这说明,在数字时代背景下,数字经济对地区差距并不会带来缩小作用。而且通过分样本分别进行分位数估计,同样可以发现数字经济整体拉大了地区组内部差距。这表明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的在数字经济的“普惠性”与“致富性”作出权衡是当下的一个重要问题。

⑥ 各省淘宝村数量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当地的普惠程度。2019 年全国 4 310 个淘宝村中,浙江、广东、江苏 3 个省份分别有 1 573、798 和 615 个,占全国淘宝村数量的将近 70%。笔者基于相关数据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南方省份淘宝村数量的促进作用更大,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由于市场化不同,数字经济发展在南方省份具有更强的普惠性,也在部分程度上佐证了本文数字经济会拉大发达地带与其他地带创业差距的结论。同时,数字经济发展由于其普惠性,也会缩小同一地带内部的差距,这在下文中的分位数回归部分得到了验证。

⑦ 结果未在正文报告。

表4 城市创业活跃度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分位数估计

因变量	lnnumber				
分位点	0.1	0.3	0.5	0.7	0.9
	(1)	(2)	(3)	(4)	(5)
Ind	0.176 *** (7.30)	0.054 *** (6.01)	0.052 *** (7.33)	0.069 *** (9.76)	-0.039 *** (-3.61)
FD	0.427 *** (8.21)	0.235 *** (12.06)	0.094 *** (6.15)	0.050 *** (3.24)	0.001 (0.05)
Road	1.696 *** (5.49)	0.886 *** (7.66)	0.550 *** (6.08)	0.507 *** (5.59)	0.074 (0.54)
Gov	1.875 ** (2.26)	-0.367 (-1.18)	0.013 (0.05)	0.226 (0.93)	-0.291 (-0.79)
Digital	0.010 *** (5.45)	0.007 *** (10.33)	0.008 *** (15.23)	0.013 *** (23.38)	0.020 *** (23.30)
Market	2.140 *** (16.14)	1.135 *** (22.85)	0.935 *** (24.06)	0.520 *** (13.33)	0.289 *** (4.91)
城市、月度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7 256	17 256	17 256	17 256	17 256
R ²	0.160	0.421	0.537	0.592	0.580

(三)创业活跃度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优势分析

基于 Luchman^[11] 介绍的优势分析方法和命令,通过确定不同影响因素对拟合优度 R^2 的贡献程度以确定不同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计算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创业活跃度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拟合优度分解

因素	全部城市 (1)	主要城市 (2)	其他城市 (3)	发达地带 (4)	其他地带 (5)
产业升级	0.036 8	0.019 2	0.010 0	0.061 6	0.022 7
金融发展	0.032 6	0.005 3	0.005 0	0.048 4	0.027 4
交通基础设施	0.021 2	0.017 8	0.016 5	0.009 6	0.018 4
财政支出	0.016 9	0.002 7	0.009 5	0.007 5	0.012 0
数字经济	0.064 8	0.101 5	0.065 7	0.125 9	0.044 9
市场化	0.051 8	0.042 4	0.045 1	0.023 6	0.042 5
城市	0.316 8	0.217 1	0.281 4	0.227 7	0.341 7
月度	0.051 7	0.055 1	0.068 2	0.044 1	0.064 5

第(1)列显示,在产业结构、金融发展、交通基础设施、财政支出、数字经济和市场化6个变量中,解释率最大的变量是数字经济和市场化,解释率大约为6.48%和5.18%。其次是产业升级和金融发展,解释率大约为3.68%和3.26%。之后是交通基础设施和财政支出,解释率大约分别为2.12%和1.69%。

第(2)列和第(3)列显示,对于主要城市,数字经济和市场化仍然是解释率最大的两个变量,解释率达到了大约10.15%和4.24%。而对于其他城市,数字经济和市场化变量的解释率也最高,大约为6.57%和4.51%。第(4)列和第(5)列显示,发达地带解释率最高的变量仍然是数字经济,解释率达到了12.59%。其次是产业升级和金融发展,解释率达到了6.14%和4.84%。而对于其他地带,数字经

济变量和市场化变量的解释率大约为4.49%和4.25%,其次是产业结构升级和金融发展水平。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一)结论

第一,创业活跃度整体呈现了快速的上升趋势,上升速度更快的城市是4个一线城市、15个新一线城市、30个二线城市以及省会城市等主要城市,主要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长期存在较大差距。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南部沿海三大地带整体处于第一档次,远高于其他五大地带,八大地带间的差距并未表现出缩小趋势。

第二,随着时间推移,分布的位置整体向右移动,整体表现为“高度变高、宽度变窄”的特征,主要城市、其他城市以及经济地带内部,绝对差距在拉大,但相对差距整体具有缩小的趋势。

第三,区域差距整体为较为明显的缩小趋势。从主要城市和其他城市来看,地区组间差距是造成总体差距更为重要的原因。主要城市其他城市泰尔指数均为下降趋势,并且主要城市下降速度更快。从八大区域来看,地区组内部差距在缩小,但仍然大于八大经济地带之间。

第四,产业升级、金融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和数字经济会拉大地区组间差距,但财政支出和市场化水平抑制了地区组间差距扩大。产业升级、金融发展、交通便利、财政支出和市场化对全部城市间和地区组内部的差距整体起到了缩小作用,但数字经济拉大了地区间差距。

第五,解释率最大的变量是数字经济和市场化,其次是产业结构和金融发展。其中金融发展更大程度上解释的是主要城市和其他城市间的差异,而非主要城市和其他城市内部。

(二)政策含义

第一,由于主要城市集中了大多数的经济资源优势,政府政策也会在主要城市有所倾斜,在带动其他城市和周边地区发展方面发挥额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由于“虹吸”效应的存在,主要城市与其他城市长期存在较大差距。因此,防止资源过度集中在主要城市,推动资源向其他城市流动,加大其他城市的创业支持力度,是当下“稳增长、保就业”和促进共同富裕的途径之一。

第二,虽然区域差距总体和八大地带内部差

距在缩小,但八大经济地带之间的差距并未表现出缩小趋势。每个经济区基于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自己的产业和经济,但八大地带所处地理位置和享有的资源优势不同。如福建、广东、海南等 3 个省份组成的南部沿海经济区,紧邻港澳台,具有明显资源优势,八大经济地带之间似乎缺乏紧密的联系。因此,应加强八大经济区之间的合作、互助、扶持,助力区域之间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第三,解释率最高的变量是数字经济和市场化,因此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是推动当下创业的重要方向之一。但数字经济会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推动落后地带数字经济的发展尤为重要。

第四,市场化和财政支出对其他城市和其他地带的促进作用更大,应扩大对其他城市和其他地带的财政支持力度,推动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能够在有限的资源中更加有效地促进地区间创业的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 [1] 叶文平,李新春,陈强远. 流动人口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机制与证据[J]. 经济研究,2018,53(6):157-170.
- [2] WONG P K, HO Y P, AUTIO E. Entrepreneurship,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GEM data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5(24): 335-350.
- [3] WENBERG K, PATHAK S, AUTIO E. How culture moulds the effects of self-efficacy and fear of failure on entrepreneurship [J].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2013, 25(9/10): 756-780.
- [4] 郑馨,周先波,张麟. 社会规范与创业:基于 62 个国家创业数据的分析[J]. 经济研究,2017,52(11):59-73.
- [5] 谢绚丽,沈艳,张皓星,等. 数字金融能促进创业吗?:来自中国的证据[J]. 经济学(季刊),2018,17(4):1557-1580.
- [6] 万海远. 城市社区基础设施投资的创业带动作用[J]. 经济研究,2021,56(9):39-55.
- [7] 孙久文,高宇杰. 文化多样性与城市创业活力[J]. 中国软科学,2022,378(6):85-95.
- [8] TERJESEN S, HESSELS J. Varieties of export-oriented entrepreneurship in Asia [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9, 26(3): 537-561.
- [9] LEVIE J, LERNER M.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performance in family and non-family businesses in the United Kingdom[J]. Business review, 2009, 22(1): 25-38.
- [10] 郭峰,王靖一,王芳,等. 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J]. 经济学(季刊),2020,19(4):1401-1418.
- [11] LUCHMAN J N. Determining relative importance in Stata using dominance analysis: domin and domme [J]. The stata journal, 2021, 21(2): 510-538.
- [5] 布朗,珂尼,特纳. 福利的措辞:不确定性、选择和志愿结社[M]. 王小章,范晓光,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34.
- [6] ROSE R, SHIRATORI R. The welfare state east and west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5.
- [7] 吉登斯.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 郑戈,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8-9.
- [8] BOVAIRD T, VAN RYZIN G G, LOEFFLER E, et al. Activating citizens to participate in collective co-production of public services [J].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015, 44(1): 1-23.
- [9] FRAHM K A, MARTIN L L. From government to governance: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work administration [J]. Administration in social work, 2009, 33(4): 407-422.
- [10] 雷雨若,王浦劬. 西方国家福利治理与政府社会福利责任定位[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2):133-138.
- [11] 杨方. 中国转型期社会保障中的政府责任[J]. 中国软科学,2004(8):40-45.
- [12] 穆怀忠. 一维到三维:人口老龄化层次提升与养老保障结构优化[J]. 中国软科学,2023(1):51-62.
- [13] 陈友华,庞飞. 福利多元主义的主体构成及其职能关系研究[J]. 江海学刊,2020(1):88-95.
- [14] FURNARI S, CRILLY D, VILMOS F, et al. Capturing causal complexity: heuristics for configurational theorizing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21, 46(4):778-799.
- [15] 同春芬,汪连杰.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我国居家养老服务的政府责任体系构建[J]. 西北人口,2015(1):73-78.
- [16] 穆怀忠. 家庭子女养老与个人养老“互补替代”效应:理论与实证[J]. 人口研究,2022(1):82-96.
- [17] 林宝.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养老服务政策新进展[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1(1):91-99.
- [18] 里豪克斯,拉金. QCA 设计原理与应用[M]. 杜运周,李永发,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149-150.
- [19] 宋健. 农村养老问题研究综述[J]. 人口研究,2001(6):64-69.
- [20] 林闽钢. 我国农村养老实现方式的探讨[J]. 中国农村经济,2003(3):33-39.
- [21] RAGIN C C. Set relations in social research: evaluating their consistency and coverage[J]. Political analysis,2006,14(3): 291-310.

(本文责编:王延芳)

(本文责编:王延芳)